



南京农业大学

本科生毕业论文

题 目：风险态度对中国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分析

姓 名：张子健

学 号：16118115

学 院：经济管理学院

专 业：农林经济管理

指导教师：周宏 职称 教授

2022 年 4 月 12 日

南京农业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毕业论文（设计），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南京农业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使用授权声明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毕业论文（设计）的规定，同意学校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南京农业大学教务处可以将本毕业论文（设计）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毕业论文（设计）。

论文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目 录

摘 要	I
ABSTRACT	II
第一章 引言	1
1.1 研究背景	1
1.2 研究意义	1
1.2.1 理论意义	1
1.2.2 实践意义	2
第二章 文献综述	3
2.1 农民创业	3
2.1.1 相关概念界定	3
2.1.2 创业的影响因素	3
2.2 风险态度	5
2.2.1 相关概念界定及测度	5
2.2.2 风险态度对创业的影响	5
第三章 分析框架与数据来源	7
3.1 数据说明	7
3.2 模型构建	7
3.3 变量构建	7
第四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10
4.1 基准分析	10
4.2 稳健性检验	11
4.3 异质性检验	11
4.4 内生性检验	12
第五章 风险态度对创业规模的机制分析	13
5.1 风险态度对创业规模的影响	13
5.1 风险态度对创业规模的中介机制	14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15
参考文献	17
致 谢	21

风险态度对中国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分析

摘 要

本文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 年、2017 年和 2019 年内的农户为调查样本，在基准分析部分运用二值 Logit 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了其风险态度对于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在机制分析部分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探究了风险态度对家庭创业规模的影响，并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融资水平在其中扮演的中介角色。研究表明：（1）风险偏好的家庭比风险厌恶的家庭更有可能做出创业选择，在用省级平均风险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以及改变样本容量与样本期的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风险偏好对创业选择的溢出效应更高；（2）风险偏好的家庭比风险厌恶的家庭更有可能扩大创业规模，加入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后影响仍然显著；（3）风险偏好的家庭会通过银行借贷而不是民间借贷的方式来缓解融资约束，增加创业资产，从而实现创业规模的增长。据此，提出完善乡村创业“兜底”政策，改善乡村营商环境和丰富乡村创业融资方式的建议。

关键词：风险态度；农村创业；创业规模；银行借贷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risk attitudes on rural household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use farm households in 2015, 2017 and 2019 of the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 as the survey sample, and estimate the effect of their risk attitudes on household entrepreneurial choices using a binary Logit panel fixed effects model in the baseline analysis section, explore the effect of risk attitudes on the size of household entrepreneurship using ordinary least squares in the mechanism analysis section, and use a mediating effects model. The mediating role played by the level of financing is analyzed using a mediating effects model. The study shows that (1) risk-averse households are more likely to make entrepreneurial choices than risk-averse households, and the results remain significant after endogeneity tests using provincial average risk as an instrumental variable and robustness tests varying the sample size and sample period, and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risk preference on entrepreneurial choices is higher in the eastern regions than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2) risk-averse households are more likely to make entrepreneurial choices than risk (2) risk-averse households are more likely to expand the scale of entrepreneurship than risk-averse households, and the effect remains significant after adding instrumental variables to the regression; (3) risk-averse households will alleviate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increase entrepreneurial assets by means of bank borrowing rather than private borrowing, thus achieving growth in the scale of entrepreneurship. Accordingly, we propose to improve the "underwriting" policy for rural entrepreneurship, improv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rural areas, and enrich the financing methods for rural entrepreneurship.

KEY WORDS: risk attitude; rural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ial scale; bank lending

第一章 引言

1.1 研究背景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如何发展壮大乡村产业，激发农村创新创业活力成为政策制定者高度关心的话题。在 2020 年第五届新农人新业态创新创业大会上，李克强总理做出重要批示：农村创新创业是增加农民就业和收入、繁荣乡村产业的重要途径。要更大力度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创业是一种高风险的经济活动。创业者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个人的风险态度会是影响创业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Knight（1921）最早提出了风险偏好的个体更加倾向于选择创业的猜想。Kanbue（1979）等人在 70 年代的研究支持了这个猜想，个体的风险态度会显著影响其成为创业者或工资获得者的概率，越偏好风险的个体越可能去创业然而，基于中国农村数据的专门研究并不多。陈波（2007）利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007 年的调查数据发现越保守的农民工，由于创业时期望投资量偏小，回乡创业难度较小，更可能回乡创业。这与上述多数研究得出的结论相反。

但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城乡融合发展日益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大大改善，农村发展工商业的硬件条件已取得了巨大进步；同时，随着大量农民工返乡定居，使得部分农村家庭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随着外部环境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农民个体的风险态度对其创业行为的影响也在悄然变化。

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首先，本文以最新的国内面板数据构建了风险态度同农民家庭创业选择的模型框架，运用省级风险均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了内生性检验，得到了较为稳健的估计结果，并发现在不同地区间，风险态度对创业选择的作用效果具有差异性。其次，将创业规模引入模型中，更为全面的探讨了风险态度对于农村家庭创业规模的影响。最后，基于融资水平的视角，发现通过正式制度渠道下的银行融资，可能在风险偏好同家庭创业的关系中起到了中介机制的作用效果。由于国内学者研究风险态度同农村家庭创业的问题较少，本文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对研究内容进行了一定的更新，补充了该领域的相关研究。

1.2.2 实践意义

对于农村创业家庭而言，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给创业对象提供拓展经营规模上的帮助，即在合理评估自身风险态度后，综合运用金融借贷工具和民间融资计划充实自身经营资产，缓解融资约束，激发创业潜力。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如果要促进更大范围的农民家庭创业活动，需要完善现代化的多元风险解决方案，探索多方主体共担创业风险的机制，针对不同风险态度的农民群体，提供差异化的创业服务，为更多的“草根创新”提供舞台，从而带动乡村产业发展，增加非农收入，实现共同富裕。

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农民创业

中国农民的创业史源远流长，纵览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的 40 多年，也是中国农民创业的成长历程。从改革开放初期家庭联产承包制推动下的农村专业户，到新形势下市场与政府所催生的“大众创业”浪潮，独特的乡土资源、资本的回流、农民企业家和返乡民工的汇聚，使创业要素不断向农村集聚，围绕三农的创业活动日趋活跃（张玉利、冯潇，2019）。农民创业成为增加农民就业和收入、繁荣乡村产业、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2.1.1 相关概念界定

本文借鉴（Shane and Venkataraman 2000；朱泓宇，2019）的观点，将农村家庭创业定义为：拥有农村户籍的居民，依托家庭禀赋和当地的自然社会条件，开展非农生产经营活动以实现家庭财富积累，创造就业岗位，为乡村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过程。这样的定义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我国农民由普通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向工商农业生产经营者角色的转变，符合当下乡村实际情况。主要包含农民家庭创办的非农企业或长期的非农自雇活动如餐饮、零售、农家乐、乡村旅游等。并利用创业资产来衡量农村家庭创业规模，以考察风险态度对农村家庭创业过程的整体影响。

2.1.2 创业的影响因素

创业作为一种复杂的商业活动，为获取超额利润提供机会的同时也充满风险与不确定性（Bennett and Lemoine，2014）。关于农民的创业动机，（Gilad and Levine，1986）的推拉理论是主流的解释，推动理论强调个体创业行为的被动性与消极性，以生存性创业为主；拉动理论突出个体创业行为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认为个体创业是为了寻求独立与自我实现等，以机会型创业为主。杨婵等（2017）的研究认为，我国农村家庭中，社会精英家庭倾向于机会型创业，而人力残缺家庭更倾向于不创业或生存型创业。

根据既有文献，影响劳动者创业选择的原因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劳动者的个体特征如：性别、年龄、职业、学历、婚姻状态、人力资本等；二是劳动者的家庭特征如家庭财富、家庭结构、家庭本位主义等；三是制度与环境：如信贷政策、社会保险、创业培训、社区支持、文化传统等制度因素和基础设施、乡村资源等客观环境。

（1）个体特征。创业者的个体特征是影响其创业选择的重要因素。国外的研究中，Ma（2002）认为社会资本的增加将提高农民创业的积极性。Folmer et al.（2010）认为个体的年龄、学历、婚姻状态、子女数量以及收入水平等是决定农民创业与否的主要因素；Li et al.（2012）提出，农民工作是否努力、意志是否坚强、是否具备战略眼光、能否承担社会责任等才是其创业成功的关键；Komppula（2014）认为，创新意识、风险承担能力以及责任心是农村情景下提升创业者竞争力的关键。

（Berkowitz and DeJong,2005）认为教育程度较高的个体，获得高收入水平的工作机会的概率高，因此他们创业所需付出的机会成本就相对较高，不利于创业。随着我国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乡村创新创业活力的激发，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我国农民群体的创业活动。一些学者分析了个体教育经历对创业的影响。如（董晓林等，2019；胡江霞、文传浩，2016）认为教育水平、参加培训等学历教育或非学历教育带来的知识水平的积累都有助于农民创业并且提高创业绩效。（尹志超等，2015；苏岚岚、孔荣 2019）利用实证研究证明了这一观点，个体的金融知识储备可以帮助个体有效地收集和分析最新政策，使得个体更容易发现市场中的潜在创业机会，进而提高其创业意愿。另外，务工经历也是影响创业的重要因素，务工过程中所积累的无论是知识还是技能都是提升他们创业能力的重要因素（庄晋财等，2020；刘迎君，2017；徐超等 2017）。一些学者分析了个体性别对创业的影响。学者从性别角度，研究性别对创业决策的影响。GEM 2012 年的研究报告指出女性的创业预期远低于男性，往往是由于创业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难以兼顾家庭，这就造成女性创业概率低（李新春等，2017）。此外，（李后建，2018；蒋建勇，2013）认为社会网络和农民社会资本有利于农民创业者获取更多资源优势，从而促进创业选择和创业绩效。

（2）家庭特征。创业是一项高风险活动，在中国绝大部分创业活动往往以家庭为单位决策和进行。一些家庭特征也会对创业活动发挥作用。如家庭财富的影响，（Buera 2009；盖庆恩 2013）认为财富水平与创业存在倒 U 型的关系，低财富水平阶段，家庭财富越多，越利于创业；高财富水平阶段，家庭财富越多，创业的概率反而越低。还有学者分析了家庭结构对创业的影响，（杨婵，2017）一般认为社会精英家庭（若家庭有成员为村干部或者德高望重者等精英背景）较普通家庭或人力残缺家庭（父母离异或家人残疾）具有更高的创业概率。并且前者为典型的机会型创业，后者是生存型创业，因为其家庭结构更脆弱，可承担的损失低，这会抑制创业行为。此外，创业活动还存在着家庭的代际传承效应，即个体职业选择直接间接受父辈职业的影响（李瑞琴，2018）。而一些农民工的职业选择还会考虑到对于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的牵绊，家庭责任感等情理因素，一定程度上受传统家庭本位主义影响

（郭云涛，2011）。

（3）制度与环境。制度与环境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同样不可忽略。制度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分。正式制度下，市场出入机制、税收优惠、财政补贴都将直接影响劳动者的创业决策（周冬梅，2020；成海燕，2019；张利斌，2013）。参加新农保等社会保险能使得农村家庭创业的概率显著提高但对创业家庭的经营资产规模和盈利水平影响并不显著（周广肃和李立行 2016a）。创业培训、创业咨询及社区支持作为个体与环境互动的重要联系，同样深刻地影响了农民创业 Scott（2012）。非正式制度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对农民创业也具有深远的意义，Nee（1992）研究发现，威权政体特征下的政府直接干预将阻碍创业活动，地方政府干预越多，农户的创业水平越低。此外，农村的物质资源和基础设施亦会影响农民创业。（张玉利、冯潇，2019）指出乡村拥有生态、环境、文化和劳动力等多重资源优势。乡村在日益俘获人们的需求与认同时，同城市的资源流动也日益频繁，创业活动也更活跃。（陈习定等，2018；郑宝华等 2016）研究发现，完善的基础设施可以使得农民可以更好的利用当地和外部资源，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而促进农民创业。

2.2 风险态度

2.2.1 相关概念界定及测度

本文将风险定义为不确定性，即风险中性，风险并非损失（Knight，1921）。借鉴（周静，2014）的研究将态度定义为认知、情感和意向的组合。认知是态度的基础，情感是态度在生理上的体验和评价，意向是一种行为趋向。风险态度（risk attitude）作为个体面临风险时所采取的态度，是指对目标结果形成正面影响或负面影响的不确定性所形成的一种心智状态，或者说是个体对不确定性形成认知后所选择的回应方式。风险态度具有相对稳定性，是某人在某一时刻对风险的看法，这种看法基于过去长期的经历、认知和评价，因而不易改变。

关于风险态度的测量有风险偏好和风险容忍度两个指标。本文采用更具主动性的风险态度来衡量个体风险态度。即根据个体愿意接受风险或不确定性的趋向程度由弱至强，将风险态度分为风险厌恶、风险中性和风险偏好三种。

2.2.2 风险态度对创业的影响

在风险态度与创业的早期研究中，大部分文献集中在利用风险态度的间接指标和效用函数分析个体风险态度对创业的影响。Knight（1921）最早提出了风险偏好的个体更加倾向于选择创业的猜想。Tucker III（1988）基于受访者对安全带使用、汽

车和健康保险覆盖的回答结果构建了风险态度的代理变量，发现风险态度对创业选择没有显著影响；而（Francis and Demiralp, 2006）则采用成瘾性消费品的购买和使用作为风险态度的代理指标，发现风险偏好对创业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二者得出相悖的结论很可能是因为仅仅使用风险态度的间接指标，造成了测量偏误，使报告结果估计有偏而不具备稳健性。

随着创业实践的日益进行，相关研究文献亦日益丰富，研究者们构建了更加可靠的风险测度变量。如 Donkers（2001）构建了一个虚拟彩票变量，通过询问受访者的彩票选择获得与风险态度有关的信息，研究发现风险偏好与创业选择正相关。

（Caliendo, 2009; Ahn, 2010）采用类似方法，发现风险偏好对创业选择显著正相关，得到了与 Donkers 相一致的结论。在个体的异质性上，刘鹏程等人（2013）利用全球创业观察（GEM）数据，指出性别间风险偏好差异可以解释其创业精神的差异，并且风险厌恶的个体选择机会型创业的概率越低。

但就来自中国的经验数据表明，尚未有一个普遍统一的结论支持风险偏好促进农民创业的观点。提出相反观点的主要有：陈波利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007 年的调查数据发现越保守的农民工，由于创业时期望投资量偏小，回乡创业难度较小，更可能回乡创业。而赞成风险偏好会促进农民创业的研究相对较多：DJankov（2005）等人利用在中国的 2004—2005 年的微观调查数据研究了社会网络、个体特征等因素对创业的影响，发现喜爱风险的个体更可能成为创业者。FriJters（2010）等人利用 2009 年中国农村—城市移民调查数据（RUMIC 2009）中的农民工数据，发现越偏好风险的农民工创业意愿越高。在个体的异质性上，陈其进（2015）利用 RUMIC 2009 指出这种效应在不同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的个体间存在差异，对于女性和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风险偏好不会影响他们的创业决策。

由上述研究不难看出，首先，针对我国农村家庭创业与个体风险态度的研究以实证分析为主，缺乏理论分析支撑；结论尚存分歧，不同个体间的异质性差异有待进一步深化区分；实证数据距今较远，随着我国农村社会面貌的快速改善，上述结论可能无法反映当前变化。其次，既有研究集中于风险态度对农民创业选择的决策影响，但创业经营是个长期的经济过程，涵盖了创业规模和创业利润等对创业质量的衡量，单纯地讨论创业决策不能从根本上反映创业的意义，农民创业的意义更应该是草根创新、增加收入和扩大就业三者的结合。最后，风险态度对农民家庭创业的影响机制缺乏论证，而识别和厘清风险偏好具体通过哪些因素影响到了农民创业，对于政策决策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第三章 分析框架与数据来源

3.1 数据说明

本文选用了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中 2015 年、2017 年、2019 年三年期的调查信息。该调查的样本涵盖全国 29 个省、262 个县（区、县级市）、1048 个村（社区），信息采集科学详实。根据本文研究内容，在通过数据整理后，得到三年的农业户籍家庭样本如下：2015 年 11071 户，2017 年 11937 户，2019 年 11369 户。在基准分析中，本文构建了样本数为 6468 的三年期平衡面板，在机制分析中，本文选取距今最近的 2019 年样本数据。

3.2 模型构建

在基准模型的构建中，由于本文运用了面板数据且被解释变量创业选择为二值虚拟变量，故首先进行了个体效应和随机效应的联合显著性检验，发现 $\text{chibar2}(01) = 5632.69$ ， $\text{Prob} > \text{chibar2} = 0.0000$ ，即应该选取面板 logit 模型。随后，进行了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 Hausman 检验，发现 $\text{chi2}(4) = 293.11$ ， $\text{Prob} > \text{chibar2} = 0.0000$ ，拒绝原假设，固定效应模型更优。综合上述检验，本文在基准分析中选取了面板 logit 固定效应模型，表示如下：

$$\text{enterprise}_{jit} = \alpha_0 + \alpha_1 \text{risk}_{jit} + \alpha_2 x_{it} + \gamma_j + \delta_t + \varepsilon_{jit}$$

其中，J 为省份，i 为家庭，t 为时间。被解释变量 *enterprise* 表示家庭是否创业的二值虚拟变量，核心解释变量 *risk* 表示家庭的风险态度，控制变量 *x* 包含了户主特征和家庭特征，省份虚拟变量为 γ ，年份虚拟变量为 δ ，随机误差项为 ε ，利用 stata15.0 进行实证分析。

3.3 变量构建

被解释变量上，选用“目前，您家是否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项目”作为家庭是否创业的代理变量，若是，则家庭是否创业取值为 1，若否，取值为 0。在机制分析中，选用“您家的工商业资产”作为创业规模的代理变量，在剔除负数后取对数值。

解释变量上，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家庭风险态度，选用对受访家庭户主关于投资态度的情景问题“如果您有一笔资金用于投资，您最愿意选择哪种投资项目？”作为代理变量。选项答案依次为：1 高风险高回报；2 略高风险略高回报；3 平均风险平均回报；4 略低风险略低回报；5 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若选 1 或 2，则认定为风险偏好型，取值 1；若选 3，则认定为风险中性型，取值 2；若选 4 或 5，则认定为风

险厌恶型，取值 3。

其他控制变量上，本文的控制变量分为户主个体特征，家庭特征，调查时间和调查区域四部分。户主特征变量包括户主的性别、年龄、婚姻、政治面貌、健康程度和受教育程度。其中，年龄方面，只保留了 18 岁至 85 岁的样本。家庭特征变量包含家庭总收入和家庭总资产，两个变量均双边缩尾 0.01，再取对数。此外，还控制了样本的调查年份虚拟变量和所在区域的虚拟变量。

机制分析变量上，融资能力是影响家庭创业选择和创业规模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将融资渠道分为银行融资和民间融资两种。是否从银行借贷的代理变量为“您家因工商业经营产生了几笔银行贷款？”若大于 0，则取值 1；若等于 0，则取值 0。是否从民间融资的代理变量为“您家因工商业经营产生了几笔民间借款？”若大于 0，则取值 1；若等于 0，则取值 0。模型变量解释及其描述性统计见表 3-1、表 3-2 和表 3-3。

表 3-1 模型变量解释

Table 3-1 Explanation of variables in the model

	变量名	variables	定义与赋值
被解释变量	是否创业	enterprise	家庭是否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活动
	家庭工商业资产	ln_busiasset	家庭在工商业项目中的资产数量
核心解释变量	风险态度	risk	风险厌恶程度，风险偏好=1，风险中性=2，风险厌恶=3
控制变量	性别	gender	户主性别，男=1，女=0
	年龄	age	户主年龄
	婚姻	marriage	户主婚姻状况，有配偶=1，无配偶=0
	政治面貌	politics	户主是否为中共党员，是=1，否=0
	健康程度	health	户主健康状况，1-5，健康状况越好，数值越小
	受教育程度	education	户主受教育程度，初等教育=1，中等教育=2，高等教育=3
	家庭总收入	ln_income	家庭一年总收入
	家庭总资产	ln_asset	家庭全部资产
	地区变量	region	调查地区，1=东部，2=中部，3=西部，4=东北
机制分析变量	时间变量	year	调研年份
	是否从银行借贷	loan_a	家庭当年在自营工商业中是否从银行渠道获得贷款
	是否从民间借贷	loan_b	家庭当年在自营工商业中是否从非银行渠道获得贷款

表 3-2 描述性统计表

Table 3-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able

变量	全样本 N=19404		东部地区 N=6261		中部地区 N=5202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是否创业(enterprise)	0.116	0.32	0.14	0.347	0.113	0.316	0	1
工商业净资产(ln_busiasset)	10.781	1.976	11.076	2.021	10.652	2.049	0	15.687
风险态度(risk)	2.839	0.461	2.847	0.45	2.863	0.434	1	3
性别(gender)	1.238	0.426	1.238	0.423	1.235	0.424	1	2
年龄(age)	55.244	13.846	55.525	13.917	57.277	13.511	16	85
婚姻(marriage)	0.896	0.305	0.901	0.299	0.889	0.315	0	1
政治面貌(politics)	0.081	0.273	0.087	0.282	0.089	0.285	0	1
健康程度(health)	2.841	1.046	2.653	1.008	2.996	1.046	1	5
受教育程度(education)	1.515	0.548	1.581	0.552	1.477	0.542	1	3
家庭总收入(ln_income)	9.509	2.487	9.693	2.546	9.504	2.278	0	12.669
家庭总资产(ln_asset)	11.923	1.491	12.323	1.491	11.666	1.488	7.783	15.111
是否从银行借贷(loan_a)	0.011	0.106	0.012	0.109	0.008	0.091	0	1
是否从民间借贷(loan_b)	0.125	0.331	0.1	0.3	0.145	0.352	0	1
地区变量(region)	1.993	0.845	1	0	2	0	1	3
时间变量(year)	2017	1.633	2017	1.633	2017	1.633	2015	2019

注：1. 家庭工商业净资产剔除负数后取对数值。2. 年龄剔除了 18 岁以下和 85 岁以上的样本。3. 家庭总收入和家庭总资产均双边缩尾 0.01 后取对数值。

表 3-3 描述性统计表

Table 3-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able

变量	全样本 N=19404		西部地区=4584		东北地区 N=2616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是否创业(enterprise)	0.116	0.32	0.108	0.31	0.069	0.254	0	1
工商业净资产(ln_busiasset)	10.781	1.976	10.383	1.937	10.62	1.673	0	15.687
风险态度(risk)	2.839	0.461	2.804	0.503	2.857	0.44	1	3
性别(gender)	1.238	0.426	1.243	0.429	1.24	0.427	1	2
年龄(age)	55.244	13.846	53.774	14.217	54.805	12.905	16	85
婚姻(marriage)	0.896	0.305	0.892	0.31	0.907	0.291	0	1
政治面貌(politics)	0.081	0.273	0.07	0.256	0.069	0.254	0	1
健康程度(health)	2.841	1.046	2.879	1.024	2.888	1.092	1	5
受教育程度(education)	1.515	0.548	1.481	0.544	1.506	0.543	1	3
家庭总收入(ln_income)	9.509	2.487	9.373	2.468	9.285	2.721	0	12.669
家庭总资产(ln_asset)	11.923	1.491	11.835	1.48	11.577	1.346	7.783	15.111
是否从银行借贷(loan_a)	0.011	0.106	0.013	0.115	0.007	0.085	0	1
是否从民间借贷(loan_b)	0.125	0.331	0.131	0.338	0.133	0.341	0	1
地区变量(region)	1.993	0.845	3	0	4	0	1	3
时间变量(year)	2017	1.633	2017	1.633	2017	1.633	2015	2019

注：1. 家庭工商业净资产剔除负数后取对数值。2. 年龄剔除了 18 岁以下和 85 岁以上的样本。3. 家庭总收入和家庭总资产均双边缩尾 0.01 后取对数值。

第四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基准分析

表 4-1 报告了利用面板 logit 固定效应模型的系数估计结果。模型 1 中，将创业选择同风险态度进行回归，以风险厌恶为参照组。模型 2 至模型 5 依次加入了户主个体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调查时间变量和调查区域变量。在核心解释变量上，所有模型均表示相对于风险厌恶家庭，风险偏好家庭做出创业选择的概率更大，且在 1%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除模型 5 外，风险中性家庭做出创业选择的概率也高于厌恶风险的家庭。在控制变量方面，模型 2 至模型 5 表明：与女性户主家庭相比，男性户主家庭更不愿意做出创业决策；户主年龄越大，越不易做出创业决策；与没有配偶的户主相比，有配偶的户主更容易创业；户主的健康水平、家庭总收入水平和家庭总资产水平同创业正相关；户主的政治面貌和受教育程度和是否创业没有明显相关关系。与 2015 年相比，农村家庭在 2017 年和 2019 年选择创业的动机和概率更低；与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的农村家庭创业意愿更高，但东北地区则相反，本文将在异质性分析部分对其进一步探究。

表 4-1 基准分析表

Table 4-1 Benchmark Analysis Table

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风险偏好	1.106*** (0.095)	0.752*** (0.091)	0.557*** (0.093)	0.473*** (0.096)	0.454*** (0.098)
风险中性	1.036*** (0.068)	0.690*** (0.066)	0.521* (0.067)	0.474* (0.069)	0.475 (0.071)
性别		-0.270*** (0.057)	-0.375*** (0.059)	0.031 (0.064)	0.022 (0.065)
年龄		-0.034*** (0.002)	-0.038*** (0.002)	-0.036*** (0.002)	-0.038*** (0.003)
婚姻		0.542*** (0.098)	0.231** (0.100)	0.166 (0.098)	0.177* (0.103)
政治面貌		0.068 (0.088)	-0.128 (0.091)	0.137 (0.092)	-0.140 (0.093)
健康程度		-0.422*** (0.025)	-0.221*** (0.026)	-0.213*** (0.026)	-0.222*** (0.027)
受教育程度		0.308*** (0.048)	0.094* (0.050)	-0.045 (0.051)	-0.053 (0.052)
家庭总收入			0.017* (0.010)	0.025** (0.010)	0.025** (0.010)
家庭总资产			1.158*** (0.027)	1.191*** (0.029)	1.190*** (0.029)
2017 年				-0.176*** (0.049)	-0.159*** (0.051)
2019 年				-1.107*** (0.066)	-1.126*** (0.068)
中部地区					0.242*** (0.071)
西部地区					0.115 (0.079)
东北地区					-0.239*** (0.100)

注：***、**和*表示估计结果在 1%、5% 和 10%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括号外为系数。下表同。

4.2 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考察了评价方法和指标解释能力的平稳性。本文通过改变样本容量和调整样本期的方法对回归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第一，剔除户主年龄在 25 岁以下和 55 岁以上的样本，这部分群体处于适龄劳动力组成结构的边缘，独立做出创业选择的概率较低。第二，选择 2019 年样本进行分析。表 4-2 报告了检验结果，模型 1 保留了 25 岁至 55 岁的户主样本，模型 2 对 2019 年的全部样本进行了 logit 回归，在控制个体和家庭特征变量后，相对于风险厌恶的样本，风险偏好的家庭更容易做出创业决策，系数有所变小，但没有改变前文的基本结论。

表 4-2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 4-2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模型 1	模型 2
risk1	0.332*** (0.11)	0.480*** (0.117)
risk2	0.241*** (0.076)	0.468** (0.08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N	17059	6168

注：模型 1 为调整样本容量的结果。模型 2 为改变样本期的结果。

4.3 异质性检验

在异质性方面，本文就样本所在的地区进行了分类分析。东部地区尤其是长三角等地工商业经济发达，城乡基础设施完善，人力资本积累丰富。而中西部地区相较于此，工商业创业的物质文化条件较薄弱，风险态度对创业意愿的刺激更弱。表 4-3 汇报了四个地区风险态度对创业决策的影响结果。除东北地区以外，其他地区的农民家庭风险偏好同创业选择正相关；相较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系数下降了 0.355 和 0.394，这说明在中西部地区，风险偏好对农民家庭创业选择的溢出效应更小。

表 4-3 异质性检验结果

Table 4-3 Heterogeneity test results

样本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风险偏好	1.193*** (0.145)	0.838*** (0.208)	0.799** (0.332)	0.308(0.602)
风险中性	1.182*** (0.101)	1.178*** (0.147)	0.247(0.251)	0.079(0.42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6261	5202	4584	2616

4.4 内生性检验

在内生性方面，虽然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内生性问题，但基准模型仍然可能会忽略一些重要解释变量，如社会保险、社会文化、制度环境以及农村的物质资源和基础设施等（周广肃和李立行 2016b；Nee, 1992；周冬梅，2020；张玉利、冯潇，2019）。为此，本文借鉴（张云亮等，2020）的研究办法，选取调查样本所在省的风险态度均值作为工具变量，省级平均风险与农户个体风险态度相关但不会直接影响农户个体的创业选择，即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外生性假设。

报告结果如表 4-4 所示。模型 1 到模型 3 分别加入了个体和家庭特征变量、地区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系数变动不大，且均在 1%显著性水平显著，说明样本越厌恶风险，越不会进行创业，这同基准分析中所报告的结果基本一致。各模型的 LM 统计量和 F 值远大于临界水平，表明不存在工具变量识别不足问题和弱工具变量问题。

表 4-4 内生性检验结果

Table 4-4 Endogeneity test results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风险态度	-0.050*** (0.009)	-0.051*** (0.009)	-0.054*** (0.00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IV 识别不足检验: LM	334.32	302.44	436.77
弱工具变量检验: F	9834.45	9963.54	9617.59
N	19404	19404	19404

注：模型 1 到模型 3 分别加入了个体和家庭特征变量、地区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

第五章 风险态度对创业规模的机制分析

由基准分析部分可得，风险偏好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具有积极影响。除此之外，本文还引入了创业资产的概念，进一步探究风险态度对农村家庭创业规模的影响，并基于融资渠道的视角，阐释风险偏好对创业规模的作用机制。

5.1 风险态度对创业规模的影响

在探究风险态度对农民家庭创业选择影响的基础上，本文还考察了风险态度对创业规模的影响。选用了工商业经营资产（单位：万元）这一变量作为创业规模的代理变量，在剔除负数后取对数值。考虑到大量样本没有创业经历，其工商业经营资产为 0，如果直接进行 OLS 回归，可能因内生性问题导致估计有偏。故本文先进行了 Heckman 两阶段的回归，在此法下，逆米尔斯比率 IMR 不显著，即由样本选择偏差引起的内生性问题不影响回归结果。表 5-1 报告了风险态度对创业规模的影响结果。第（1）列为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的估计结果。风险厌恶对创业规模有 0.278% 的不利影响，且在 1% 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农村家庭越厌恶风险，扩大创业经营规模的概率就越小。第（2）列为采用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F 值和 LM 统计量高于临界水平，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和识别不足的问题。在控制其他变量后，风险厌恶度的增加对创业规模具有 0.574% 的显著负向影响。综合两种结果，风险厌恶在对农村家庭创业选择具有负向效应时，也抑制了创业规模的扩大。

表 5-1 风险态度对创业规模的影响

Table 5-1 Impact of risk attitude on the scale of entrepreneurship

	(1)	(2)	(3)
模型	OLS	IV-2SLS	Heckman
风险态度	-0.278*** (0.045)	-0.574*** (0.083)	-0.366(0.05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530*** (0.212)	3.540*** (0.331)	0.765*** (0.345)
弱工具变量检验：F		3874.412	
IV 识别不足检验：LM		963.733	
LR 检验			135.350
M 值			0.234
观测数	14981	14981	14981

5.1 风险态度对创业规模的中介机制

创业作为一项复杂的经济活动，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需要充分的资金、人力和技术等要素支持。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风险态度对农民家庭创业选择和创业规模都产生了影响，那么风险态度具体是通过何种途径对创业者的市场开拓发生作用呢？这仍是本文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根据（张云亮，2020）的研究，中国城乡家庭创业的选择和规模会同时受到信贷约束等外部机制和金融素养、人力资本等创业者自身特质的影响。就农村而言，由于农村居民家庭相对于城镇居民家庭资本存量较低，工商业配套的基础设施偏向落后，创业初期需要资金数量会出现更明显的瓶颈，即融资渠道的拓展对于创业规模的扩大有着更突出的作用。

所以，本文采用了检验中介效应时最常用的逐步检验回归系数的方法，将重点检验融资约束这一外部机制在风险态度和创业规模中所起的中介效应。表8分别报告了中介机制为银行融资和民间融资两种渠道时的回归结果。在前者分析中，风险偏好对创业规模的影响系数为0.157，加入银行借款变量后，系数下降到0.116，统计显著性水平保持不变。说明了相较于厌恶风险的家庭，偏好风险的家庭更有可能通过银行借贷去融得信贷资金进而增加经营资产，扩大创业规模。在后者的分析中，加入民间借款变量后，风险态度对创业规模的影响不显著，说明民间融资作为风险态度对创业规模影响的中介机制并不充分。

表 5-2 风险态度对创业规模的中介机制

Table 5-2 Mediating mechanism of risk attitude on entrepreneurial size

银行融资				民间融资		
	(1)	(2)	(3)		(4)	(5)
	创业规模	银行借款	创业规模		创业规模	民间借款
风险偏好	0.157** (0.062)	0.024*** (0.004)	0.116** (0.062)	风险偏好	0.157** (0.062)	0.041*** (0.018)
风险中性	0.277*** (0.043)	0.017*** (0.003)	0.249*** (0.043)	风险中性	0.277*** (0.043)	0.023*** (0.013)
银行借款			1.696 (0.107)	民间借款		0.023 (0.013)
N	14981			14981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我国正在乡村战略的引领下，大力推进农村创新创业，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村家庭创业不仅可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调动亿万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增加农民家庭非农收入，还日益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主力军，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动能。关注当下创业者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对于促进双创工作至关重要。越来越多的研究把目光聚焦于农村家庭创业，探讨了其与包括个体特质、家庭特征以及创业制度和环境等方面的关系。本文以农村创业家庭户主的风险态度为参考，估计了其对创业选择和创业规模的影响以及其中的作用机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相较于风险厌恶的个体，风险偏好的农村家庭选择创业的可能性更大，运用省级风险均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后，估计结果基本一致；在不同地区间，风险态度对创业选择的作用效果具有差异性，东部地区风险态度对创业选择的溢出效应大于中部地区大于西部地区。

第二，引入创业资产的概念后，运用 OLS 和 IV-2SLS 模型分别估计风险态度对农村家庭创业规模的影响，发现风险厌恶对创业规模的扩大有显著负向影响，分别为 0.278% 和 0.574%。

第三，基于融资水平的视角，发现通过正式制度渠道下的银行融资，可能在风险偏好同家庭创业的关系中起到了中介机制的作用效果，中介效应占比 44.29%，而通过非正式制度的民间融资无此机制效果。

针对各项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如果要促进更大范围的农村创业活动，需要为农村家庭分散创业风险，探索“农户+政府+市场”创业风险共担机制，农户要合理评估自身的风险态度，发扬拼搏进取的创业精神；政府要继续优化创业环境，定期开展创业培训，帮助农村家庭不断更新对创业活动的风险感知水平；市场可以为不同风险态度的农民群体，提供差异化的创业服务，为更多的“草根创新”提供舞台，从而带动乡村产业发展，增加非农收入，实现共同富裕。

第二，拓宽农村家庭创业的融资渠道，可以通过农村双创补贴、支持设立专门的合作组织等方式为农民创业提供资金保障，降低市场融资风险；也可以鼓励农村金融机构实行农村固定资产抵押贷款的试点，使农村家庭金融资产更加充分流通，从而用市场的方式缓解融资约束问题。

第三，政府和研究机构要积极探索关于风险态度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其他作用机制。如创业者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对风险容忍度更高的个体往往具有更高的人际信任水平，更高的互信水平会帮助创业者拥有更多的信息获取渠道和更有信誉的

口碑形象；又如创业者的商业保险情况，风险厌恶的个体会通过购买更多的商业保险来分散自身风险，购买商业保险的资金可能会对创业资金产生挤出效应，从而不利于创业活动的开展。

参考文献

- [1]陈波. 风险态度对回乡创业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 2009(03):84-91.
- [2]成海燕, 徐治立, 张辉. 科技金融政策促进科技企业发展的资源配置效率研究——来自北京市的实证调查[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0,37(04):119-128.
- [3]董晓林, 孙楠, 吴文琪. 人力资本、家庭融资与农户创业决策——基于 CFPS7981 个有效样本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 2019(03):109-123.
- [4]郭云涛. 创新创业的四维向度[J]. 中国发展观察, 2015(07):21-24.
- [5]胡江霞, 文传浩. 人力资本、社会网络与移民创业绩效——基于三峡库区的调研数据[J]. 软科学, 2016,30(03):36-40.
- [6]李新春, 韩剑, 李炜文. 传承还是另创领地?——家族企业二代继承的权威合法性建构[J]. 管理世界, 2015(06):110-124+187-188.
- [7]刘迎君. 禀赋特质、农民工回流创业与地域分层意愿[J]. 贵州社会科学, 2017(03):133-140.
- [8]苏岚岚, 孔荣. 互联网使用促进农户创业增益了吗? ——基于内生转换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20(02):62-80.
- [9]徐超, 吴玲萍, 孙文平. 外出务工经历、社会资本与返乡农民工创业——来自 CHIPS 数据的证据[J]. 财经研究, 2017,43(12):30-44.
- [10]肖忠意, 李瑞琴, 陈志英, 黄玉. 创新创业制度环境、创业行为与家庭资产选择[J]. 世界经济文汇, 2018(04):20-35.
- [11]尹志超, 宋全云, 吴雨, 彭嫦燕. 金融知识、创业决策和创业动机[J]. 管理世界, 2015(01):87-98.
- [12]杨婵, 贺小刚, 李征宇. 家庭结构与农民创业——基于中国千村调查的数据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 2017(12):170-188.
- [13]庄晋财, 芮正云, 曾纪芬. 双重网络嵌入、创业资源获取对农民工创业能力的影响——基于赣、皖、苏 183 个农民工创业样本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 2014(03):29-41.
- [14]周冬梅, 陈雪琳, 杨俊, 鲁若愚. 创业研究回顾与展望[J]. 管理世界, 2020,36(01):206-225+243.
- [15]周广肃, 李力行. 养老保险是否促进了农村创业[J]. 世界经济, 2016,39(11):172-192.
- [16]周广肃, 谭华清, 李力行. 外出务工经历有益于返乡农民工创业吗?[J]. 经济学(季刊), 2017,16(02):793-814.

[17]周广肃, 樊纲. 互联网使用与家庭创业选择——来自 CFPS 数据的验证[J]. 经济评论, 2018(05):134-147.

[18]张云亮, 冯珺, 赵奇锋, 柳建坤. 风险态度对中国城乡家庭创业的影响分析——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3 期面板数据的证据[J]. 财经研究, 2020,46(03):154-168.

[19]Banerjee, A. and Newman, A. “Occupational Choice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3, pp. 274—298.

[20]DeCicca, P. “Health Insurance Availabil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Up John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2010, No. 10—167.

[21]De Mel, S. ; McKenzie, D. and Woodruff, C. “Returns to Capital in Microenterprises: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8, 123(4) , pp. 1329—1372.

[22]Django, S. ; La Porta R. ; Lopez-de-Silanes, F. and Shleifer, A. “The Regulation of Entr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2, pp. 1—37.

[23]Eggleston, K. ; Sun, A. and Zhan, Z. “The Impact of Rural Pensions in China on Migration and Off-farm Employment of Adult Children and Extended Households’ Living Arrangements.” *Manuscript*, Stanford University, 2015.

[24]Evans, D. S. and Leighton, L. S. “Some Empirical Aspects of Entrepreneurship.”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9, pp. 519—535.

[25]Fairview.; Kapor, K. and Gates, S. “Is Employer-based Health Insurance a Barrier to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011, 30(1) , pp. 146—162.

[26]Ghani.; Kerr, W. and O’Connell, S. “Spatial Determinants of Entrepreneurship in India.” *Regional Studies*, 2014, 48(6) , pp. 1071—1089.

[27]Glasser, E. and Kerr, W. “Local Industrial Conditions and Entrepreneurship: How Much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致 谢

行文至此，总是要想起大学四年的点滴日常。

感谢校园和下马坊遗址公园的每一处风景，你们是最常聆听我内心声音的朋友。

感谢校园每一位老师和师兄师姐对我的指导帮助，让我坚定前进。

感谢 223 的每位小伙伴，与你们相遇是我大学四年最难忘的经历！

特别地，要感谢刘延小伙伴，让我拥有了第一次一个人站在手术室外的经历，你纯真无邪的微笑经常治愈我，希望我们友谊常在。

感谢我的家人和身边每一位真诚的朋友，你们的善意给予我无数温暖。

感谢命运，把我带到此时此刻，期间经历太多，失去太多，做过坏事，但绝大部分时间是好人。

疫情之下，还要感谢我的祖国，这个伟大民族在抗击 COVID-19 中所作的贡献。

山水有来路，早晚复相逢。卫岗 1 号，再见！